

论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初步发育

Initial Development of Inherent Growing Power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吴忠民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 副教授)

一

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源于自我本体的、与现代化相吻合的内部推动力量。它有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 有机性。首先, 是指在社会机体中, 现代化的波及面非常广泛, 而不是仅集中在某一个层面或某一个环节。其次, 是指大工业、现代知识等现代化内容在社会机体中的渗透与扎根。也就是说, 现代化必须同民族传统融为一体, 以之为某种必要的框架和根基; 而且, 现代化过程还必须与大众的需要相吻合, 逐渐成为其生活、行为、观念中不可缺少的成分。这一特征说明, 现代经济在产值方面的增幅同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增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并非简单地保持着同步的关系。

第二, 自然递进性。这与有机性特征是密切关联的。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 其启动阶段的人为成分或许要明显一些。一旦现代化的有机性大致生成, 启动阶段也就结束了。有了内在生长力有机性的基础, 现代化便会形成一种发展的“惯性”。这时, 就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推进方式而言, 必定是以自然递进为主, 以人为拉动为辅。如果看不到这一点, 人为的成分过大, 现代化过程受挫的可能性便会相应增大。

在我国, 严格地讲, 现代化内在生长力是从1978年末、1979年初才开始真正发育。1949年之前的一百多年里, 尽管也有了现代化的事物、实体, 但是, 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 时代的主流在于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 现代化事物是从属于这个主流的, 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不可能形成。1949~1978年, 虽然重工业体系初步形成, 科学技术也有了一定发

展, 但是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的发育仍未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 与现代化有关的事物从属于当时日益升级的政治运动, 而没有自己地位的独立, 更不用说居于时代的主要位置了。只是到了1978年之后, 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成长才真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

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形成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由若干个不同但又是相互衔接的具体的历史阶段组成。从1978年末到现在的这段时间内, 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初步发育”的时期。

二

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初步发育, 第一层涵义是, 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不仅已经开始发育, 而且还进一步引起全社会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趋势。表现为:

1.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实现了初步的有机结合。

准确地讲, 在中国,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谁也无法离开对方。社会主义应当是具有现代化内容的社会主义, 而现代化则应当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在1978年之前一段比较长的时期内,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内容经常是分离的, 或者, 现代化建设只是简单地附着于社会主义, 居于一种十分明显的次要地位。50年代初期, 出于重建社会结构的迫切需要, 由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者脱离所造成的危害还不很明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 本应开始大力推进现代化, 然而整个社会却把重心放到了单纯的“社会主义”方面, 片面追

求扩大公有化范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1978年以来的十几年里,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实现了初步的、却是有效的结合,两者的关系逐渐得以摆正。可以说,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是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从根本上得以发育的基本前提。它为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形成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第一,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一些重大的体制可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客观需要作必要的调整,以保证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第二,只有在两者有效结合的基础上,方可实现由社会主义的“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从而有助于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正常发育。十几年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得以确立,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初级资金市场、各种劳务市场以及金融市场已初步形成,并日趋扩大。这样,就确保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能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基础上开始发育。

2. 民众与现代化初步的广泛结合使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具有了一种强劲的底力。

1978年以前,中国确曾试图推进现代化建设。尽管现代化建设始终没有成为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但是有时却也在外观上显得轰轰烈烈,如大跃进运动。即便是在这种涉及全社会的运动中,现代化也并没有真正实现同民众的有效结合。1978年以来情况发生巨大的变化,民众同现代化开始了广泛的结合:第一,民众的切身利益开始同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中国真正的现代化过程始于体制改革。民众从中得到了实际利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实际收入呈持续递进的势头,而且幅度很大。按可比价格计算,以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数为100,到1990年则增至230.9。按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为316元,到1990年,则分别增至629.8元和1387元。第二,民众的日常生活同现代化进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众日常生活的内容与方式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从民众的消费生活和闲暇生活来看,还是从民众的代际生活与社区生活以及总体生活质量来看,现代化的影响很大。耐用消费品平均每百人的拥有量,1978年为电视机0.3台、录音机0.2台、电风扇1.0台、洗衣机几乎没有,到1988年,则分别增至13.2台、8.3台、13.4台、6.8台。第三,社会流动度增大,社会成员从总体上说开始摆脱过去的那种身份隶属化、工作固定化、居住不变化的局面,垂直流动、水平流动、结构性流动,以及自由流动日趋多样。

民众与现代化的结合,使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现代化与民众自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民众日常生活同现代化进程的相关性,决定了民众日常行为取向逐渐与现代化认同。而社会流动度的增大,又在客观上有助于启动各个区域、各个群体甚至于每个社会成员的动能。这一切,使得现代化成为中国整个民族的共识,成为民众生活所需,成为民众行为的价值取向。

3. 开放与现代化初步的有机结合为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杠杆。

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开放。1949年之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国门是被打开了,但是,当时的对外开放是一种畸形的开放,是半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开放,因而不可能给当时的中国现代化活动带来足够的动力。相反,总的看来,当时的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不小的破坏作用。1949~1978年,始初一面倒向苏联,继之自我封闭,几乎中断了对外开放。

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开放。1978年,进出口总额为206.4亿美元,1988年增至1027.9亿美元;1983年,实际利用外资19.81亿美元,1988年增为102.26亿美元;1982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为1.89亿美元,1988年上升为12.53亿美元;1980年,旅游外汇收入为6.2亿美元,1988年上升为22.5亿美元。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引进技术改造项目5000多项,成交额34.5亿美元。另外,中国还大规模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

对外开放与现代化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彼此不可分割。这十几年的对外开放,毫无疑问地促进了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增强。对外开放可以使一个民族感受到一种有益的压力,使之产生出一种民族的超越精神,进而使民族的原动力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开放还可以为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找到一定的参照,直接促进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

4. 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初步有机结合使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开始具有了真正的有机性。

1978年之前,由于“左”的思潮盛行,过分地强调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其他则一律予以排斥。结果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忽视,至少是轻视了民族传统的作用。

1978年以后,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民族传统开始复归,并同现代化开始了初步的有机结合。其一是开放过程的推进。十几年来中国的开放势头比较迅猛,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准备,忽然打开国门,置身于众多国家之中,面对许许多多远比自

已发达的国家,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需要在自身体内寻找一种依托物,以求得本国人民的认同与凝聚,避免离心解体。于是,民族传统便开始为人们所关注,甚至是着意强化。其二是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反复,人们也逐渐发现,民族传统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民族传统与意识形态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这样,并非偶然地,中国开始实现民族传统与现代化内容的初步有机结合。

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这种结合增强了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第一,直接增强了中国现代化的内部动力。从民族传统,中国人可以寻找到共同的民族血脉。以民族血脉为纽带,中国人的力量、意志、情感可以得到极大的凝聚。这种凝聚力进而可以使中国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可以使中国所蕴藏的能量和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和释放。其程度远远超过民族成员力量简单相加的总和。而且,凭借着由民族传统而产生的超越意识亦将保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缺少这种动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能否进行下去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是很难正常进行下去。当然,在考虑这种动力时,要防止狭隘的人文种族主义的思想,还要防止旧的时代因素借民族传统之名而复活。否则,必定会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正常发展。第二,有助于形成完整的中国现代化模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否完整,将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现代化内在生长力有机性的强与弱,并会进而对这个国家现代化过程的有序性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形成一个完整、合理的中国现代化模式而言,民族传统是一个重要参数。例如,从民族传统着眼,中国现代化进程得以稳定的制约机制具有与西方社会很不相同的特色,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保留一些由重人伦所进一步导致的重德治的传统,以此与法治相得益彰,求得社会的稳定。再如,就现代化的推进方式而言,同西方社会倾向于不断重建有所不同,中国社会则更倾向于逐渐转型。另外,民族传统对于形成中国的大、中、小型社会单元的特有结构也会有不小的影响。

5. 现代知识的累积、传播同现代化实际进程的有效结合,使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更具有着一种渗透力和扩散力。

不可否认,1949~1978年中国的现代知识在累积、传播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却存在着三个突出的症结。第一是没有广泛地与生产领域结合。如果说在军工技术以及某些基础理论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步,那么在适用技术方面只是取得了比较小的进展。第二是其片面性。当时,人们对于现代知识的理解仅限于自然科学及技术,而忽略了现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更为重

要的是,当时人们过于漠视、甚至是贬低教育,使其水平及处境每况愈下。第三是现代知识地位的不断下降。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整个知识界、知识成果的价值不被确认,现代知识呈愈益贬值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些症结的存在,使现代知识在1978年以前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没有起到应有的渗透及推动作用。

1978年以后现代知识的累积、传播与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开始了初步的却是富有成效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效杠杆。具体表现在:第一,人们对于现代知识的重要性开始有了比较普遍的确认。第二,现代知识开始与生产领域实现广泛的结合,尤其是适用技术趋于普及,从而直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对于中国工业经济也产生了很大的贡献。共和国成立后各个时期工业经济增长率总额中技术进步所占份额:1952~1957年为46.9%,1957~1965年为20.7%,1965~1976年为3.6%,1981~1985年为30.5%,1985~1989年为30.1%。第三,现代知识的累积与传播趋于整体化。教育的水平、社会地位和规模在这十几年间,呈上升趋势;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有了比较明显的长足发展,促进了广大公众开始确立现代观念与现代行为方式,同时也促进了劳动者文化素质的提高。

综上所述,可以说1978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得到了初步的发育。这对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使得中国的现代化的推进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决不会由于一些偶发性的因素而中断。

三

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初步发育的另一层基本涵义是:这一阶段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成长过程中的不足与不规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一定的抑制、扭曲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

1. 现代化内在生长力发育的整体化程度不够。

总的说来,中国过于追求经济方面的增长和改革。人们倾向于将经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等同起来。1979~1988年,经济的确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6%,这在世界各国中是不多见的。经济发展保持某种程度的超前性,只要适度,对于整个社会机体可以起一种积极有效的带动作用。问题在于,这种超前不能过度,不应过分超过其他方面发展的幅度。相比之下,非经济领域如教育、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进展

幅度则过小,并且改革也不够配套。

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进一步成长、形成,乃至对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都会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第一,会降低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有机性。社会发展可能首先受惠于发展最快的环节,但不久就会受制于发展最慢的环节。长时期片面发展经济,不仅无法得到其他环节、层面的有效支援,而且,就连经济发展的成果也不可能被社会机体给予有效的吸收,无法内化为社会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对社会发展的方向也会产生有害的影响。经济因素说到底是一种物质的力量,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被动自发性。因此,单纯的经济增长无法全面地解决有关社会机体发展的定向问题。经济的发展若失去控制,其后果是严重的,不仅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异化现象,还极有可能造成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

2. 现代化内在生长力成长的有序程度不高。

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虽得以初步发育,但与之相对应的是生长秩序的相对紊乱。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发展过程的摇摆幅度过大。这一时期是以纠正1977~1978年经济过热现象开始的。1979、1980年经济发展开始稳定下来。但时隔不长,经济又开始新的过热,尔后又低落。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起伏度过大。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984年比1983年增长14.6%,1989年比1988年增长3.6%,差幅高达11个百分点。80年代,同是发展中国家,泰国经济发展的最高速度是1988年的11.0%,最低速度是1982年的3.2%,差幅为7.8个百分点;印度最高年份1988年为10.4%,最低年份为3.7%,差幅只有6.7个百分点;南朝鲜最高年份1986年为12.4%,最低年份1985年为5.4%,差幅为7个百分点。经济发展过大的摇摆度既不利于形成发展过程的内在生长机制,也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第二,发展的区域分散性与重复性。1978年以前,总体看,是统得过死。1978年以后,中央政府将许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另一方面,各地区竞相发展某些相同的行业,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重复生产,追求地区经济的完整体系,搞“大而全”、“小而全”,趋同状况日益突出。各区域内的这种“有序”,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无序”状态。由此,国家作为一个发展整体的意义大为削弱。长此以往,不仅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和低下的效益,还会使整个国家机体产生离心的倾向。第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这期间社会问题无论是从种类来说还是从数量来说,均增长很快。不妨将这种状况视为社会问题的并发症。例如,1982~

1988年,全国重大案件增幅很大,为40余年来所罕见:按指数计算,以1982年重大案件数为100,1983年为101.8,1984年为99.5,1985年为130.6,1986年为152.8,1987年为191.0,1988年为316.6。社会问题的并发症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进而会对现代化进程的平稳递进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还会挫伤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削弱发展进程的后续推动力。

3. 开放中的重心偏离并酝酿着更大的偏离。

在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重心偏离的现象。主要表现在:第一,心理倾向的某种外移。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可以说刚刚从封闭了几十年的圈子里挣脱出来,接触到了一个新奇而又充满未知数的广大世界,一时兴奋而又热烈。这时,人们情绪化的东西往往要多于理智化的东西。许多人深感本国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差距,过分地看重别的国家,过分地看轻自己,同时却又不能真正地把握住本民族与别的民族各自的具体状况,因而就难免造成心理倾向外移。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民族自尊受到严重伤害的时期。第二,直接引接与借鉴过程中出现某些举措的失当。这一时期,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呈持续上升趋势,而且结构也日趋合理,但是在有些地方,并没有有效地实行进口替代政策,购进了一些超过了正常限度的商品。例如,1981年,进口的小轿车为1 401辆,1985年剧增至105 775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6年,国内生产的轿车只有2 205辆,1987年只有4 045辆。

这种重心偏离的现象对于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正常成长非常不利。首先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减弱甚至是破坏了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人们心理倾向的外移对于民族的自尊与自信会造成严重的伤害。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起步之初,自尊遭到适当的伤害,会有助于民族的自我反省。但是,这种伤害必须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就是民族自尊与自信心不能被毁坏。否则会直接减弱民族的向心力,致使现有的民族动能无法产生最佳的效应。其次,在某些方面限制、约束了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展。对于外国一些重要工业品的不恰当引入,必定会对民族工业造成不利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尽管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在这一时期得以初步发育,从而造成中国现代化的不可回转之势,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在这一时期还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使得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还不很定型,存在着减弱、变形的可能性,并且如果不及时给予矫正,还有可能进一步减缓中国现代化整个进程,甚至有可能将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某种误导。

(责任编辑 孙立明)